



新冠肺炎 深度

武汉作为“朋克之城”：自由的头脑如何面对瘟疫、谎言与封城

用清醒的大脑，把谎言蒸发，“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战争，人人自危，但无从反抗。”

特约作者 科长 发自北京 | 2020-0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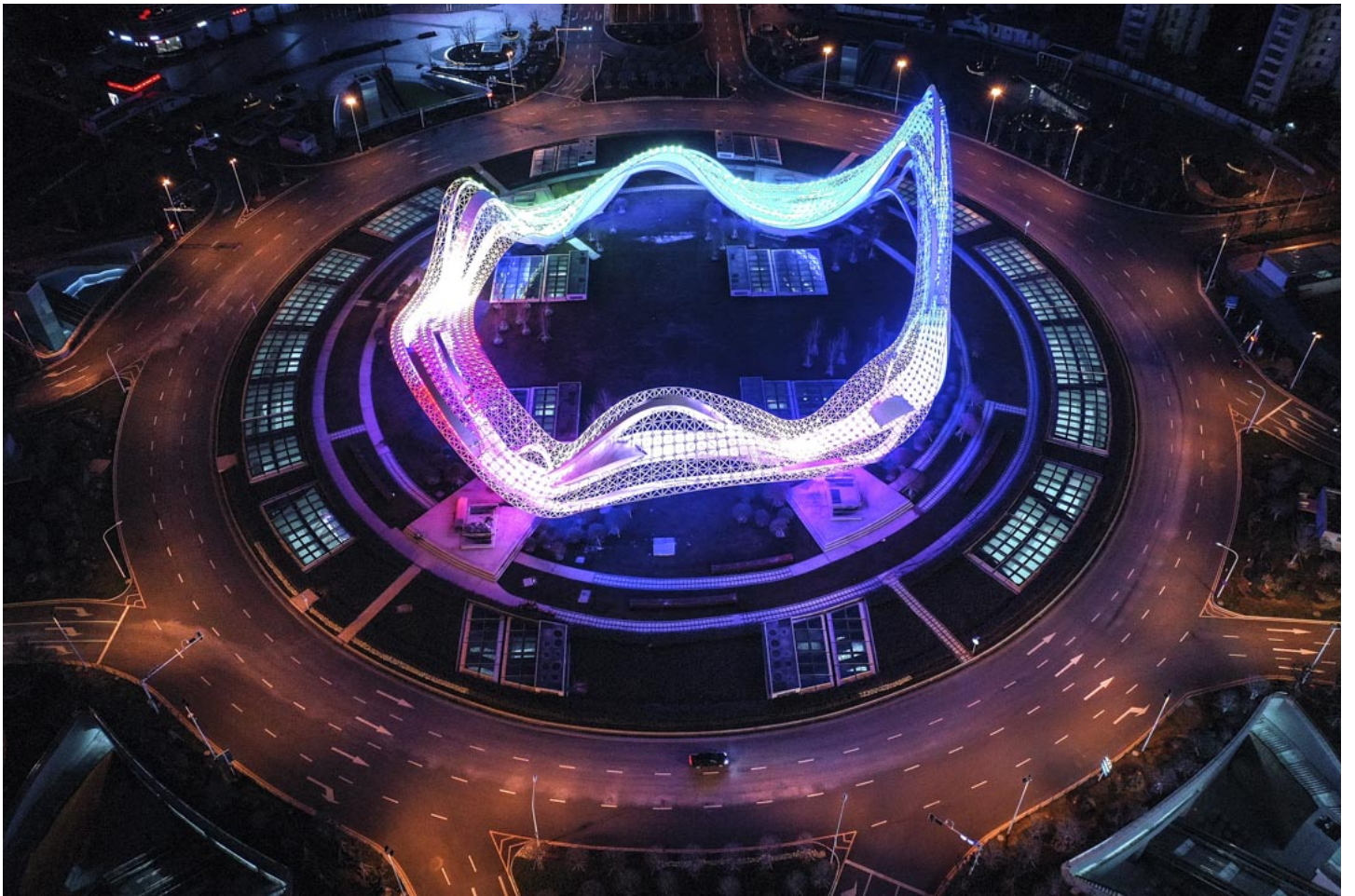
VOX是武汉第一家摇滚专属场地。VOX 代表的是“Voice of Youth, Voice of Freedom”，这句话仍是许多武汉摇滚青年的座右铭。图：VOX LIVEHOUSE Facebook

“内中有多大不幸与悲哀，面子上也就是这样的纹丝不动。好比长江，漩涡都在深水里，表面只是平静。”湖北作家池莉在小说《她的城》中的这段话，正适合封城中外表寂静的武汉。这个长江汉水交汇的中部都市，原本喧闹而美丽，曾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也是南来北往的重要枢纽。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时，因为急速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武汉被“封城”，这是近代中国首次非政治军事性封城。随后，除神农架林区外的湖北各地陆续实施疫区封锁，超过5000万人被困家中。

封城第23天夜里，武汉上空突然电闪雷鸣，打破了大半个月的死寂。次日白天，伴随北方寒潮而来的一场大雪，仿佛诉说着这个城市正在遭受的苦难。武汉方言用“不服周（音zuo）”表示不服气的意思，这个讲法源自楚国对周天子的不服从。而关心中国当代音乐及思想发展的人会知道，武汉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这里还被称为“朋克之城”，是1990年代开始的中国摇滚重镇。

亦即这个“不服周”的地方孕育了一群向往自由的灵魂，他们孕育出的独立音乐作品有反叛的精神，有诙谐的腔调，也有隽永的气质。而今疫症封城，我们联络到五位武汉独立音乐人：生命之饼乐队主唱吴维、花伦乐队吉他手丁茂和朱明康、Chinese Football 乐队主唱徐波、HINC 组合贝斯手狗狗。他们分属1970年代到1990年代出生的不同世代，风格也各异。抗疫的日子里，我们就和他们聊聊武汉的摇滚身世，以及封城前后各自的状态与思考。

“香港有《海阔天空》和《愿荣光归香港》，台湾从《美丽岛》到《岛屿天光》”，“我们自己三十年来没有什么集会的场景和文化，现在有合唱的机会也无歌可唱，唯一能唱的就是国歌。”



2020年2月16日，封城中的武汉。图：Getty Images

“朋克之城”的诞生与演变

由于公共交通停滞，本次疫情中出现了很多民间自救团体协助运送物资，“武汉鲁磨路救援会”就是其中一个。而这个团体由一群本地摇滚乐迷们组成，大家平日混迹于鲁磨路一带，经常一起喝酒、看演出。武汉最重要的 Livehouse，生命之饼乐队前鼓手朱宁创办的 VOX 和主唱吴维曾担任经理的 Prison，都在位于武昌的鲁磨路上。

紧邻 VOX 和 Prison 的，就是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整个鲁磨路沿线更是高校云集。武汉的大学生人数在中国乃至全球城市中都名列前茅，目前有超过100万在校大学生——这也是武汉成为中国摇滚重镇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学生一向是摇滚乐乃至流行文化的主力消费者和创造者。

70后的吴维，从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毕业回到武汉后，于1996年组建了当地第一支朋克乐队“生命之饼”，队名取自《圣经》中的“擘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不过，这支后来成为传奇的乐队并非武汉摇滚的起点。

1990年代，大学生人数和普遍收入的提高、西方“打口带”的流通，催生了武汉本地的摇滚乐。1993年，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致命的诱惑”乐队带起了大学生乐队风潮，随后“同志”（Comrade）乐队风靡各高校的巡演正式宣告武汉地下音乐的开始。这时期成立的还有“人异”乐队，其成员包括后来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后大红的“达达”乐队主唱彭坦和贝斯手魏飞。

“生命之饼”成立之后，“妈妈”、“死逗乐”和“愤怒的狗眼”等后来知名的朋克乐队相继在武汉诞生。吴维成为武汉朋克音乐的领袖，甚至曾在家里和朋友组织“武汉朋克学习班”。

1998年，“生命之饼”联合“妈妈”、“死逗乐”和“愤怒的狗眼”，四支朋克乐队带着一套磁带转录的小样去外地巡演，一时引起轰动。当时《通俗歌曲》杂志编辑彭洪武第一次提出，武汉是“朋克之城”。这个称号从此流传至今。

与同时期的北京朋克有专门演出场地不同的是，武汉朋克们需要不停寻找排练和表演场所。他们一开始常去大学的活动中心或 KTV 这样的地方，后来因为发出的噪音太大而屡被

驱赶。纪录片《绝不松开我的拳头》（导演王水泊，2014）详细展示了那个时候武汉的地下音乐场景。SUBS 乐队主唱、当时在武汉上大学的抗猫，辍学后和朋友一起开了 Boys Toys 酒吧，成为朋克乐队和乐迷们的聚集地，但没过半年就因为经营不善而关门。



位于武汉市鲁磨路的VOX LIVEHOUSE，当中其中一个演唱会片段。图：VOX LIVEHOUSE Facebook

直到2002年，朱宁退出“生命之饼”后开办 VOX，武汉才有了第一家摇滚专属场地。VOX 代表的是“Voice of Youth, Voice of Freedom”，这句话仍是许多武汉摇滚青年的座右铭。

以“生命之饼”为代表的武汉早期朋克作品，有着简单的旋律、快节奏和直言不讳的歌词，经常触及社会议题和政治敏感话题。比如在2002年发表的歌曲《Wuhan Prison》里，吴维就直白地把这个城市比喻成一座“监狱”：

I am living in the city, with my family
We can't feel freedom and safety
We feel like in a prison
I want to leave this hell, but can't find a way
So many fucking rules, but I don't care
Riot, riot this city... Wuhan Prison

在加入长笛和风笛之后，“生命之饼”的歌听起来更加悦耳，但反叛精神不改。上海音乐人梅二曾经评价，“吴维始终坚持着底层反对者的立场……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

但吴维并不认为武汉这个城市有天然的“朋克精神”。“武汉只是比其它城市早出现了几支朋克乐队而已。”他直言，“每个人对朋克的理理解可能都不太一样，我的理解就是不管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做一个勇敢、诚实、善良，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反抗精神的人。”

进入21世纪，武汉大部分朋克乐队相继解散。随后互联网大潮袭来，年轻人接触到的信息和文化更加多元，新一代乐队的风格也更多样。



花伦乐队。图：受访者提供

2004年在武汉成立的器乐摇滚乐队“花伦”，自成一派的美学风格迥异于他们的朋克前辈们，当时被誉为“中国后摇滚浪潮先锋”。近年很受关注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导演胡波，2018）就由花伦配乐，他们也借此成为金马奖历史上首个入围“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项的乐队。

花伦的早期成员里，目前只有80后的吉他手丁茂和朱明康还留在队中，他们仍在不断尝试新的创作和录制方式。“之前专辑创作的目的性很强，”朱明康介绍正在筹备的新专辑时说，“这次我们想模糊掉目的地，记录前往目的地的过程，有可能是一张带着实验精神的唱片。”

得名于香港鬼才导演葛民辉处女作的乐队“AV大久保”成立于2006年，结合了新浪潮、朋克舞曲等多种风格的他们，听起来怪诞而诙谐。这个乐队无论在视觉还是听觉上都很“武汉”：他们会把乐队成员贴到黄鹤楼上作为宣传照，也会把粗俗露骨的“汉骂”写进歌词里。2019年，原班人马重组为白纸扇乐队，加入了更多电子元素，一首《东莞》上线后很快成为热门金曲。



Chinese Football 乐队主唱徐波。图：受访者提供

85后的徐波于2011年在武汉组建了兼具 Emo 和 Math Rock 风格的“Chinese Football”乐队，被乐迷们暱称为“国足”，如今在国内外都有众多拥趸。他们在全球独立音乐平台 Bandcamp 上成绩不俗，最近还联合日本女子乐队 Regalily 一同进行了中国巡演。

徐波在乐队介绍里写道：“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全力以赴，体无完肤。”这种既励志又有点“丧”的气质，在他们的歌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2019年发表的《漂流人间》：

你问我去哪？我要去哪？

我毫无防备就登上了这艘船

头破血流也靠不了岸

在乘风破浪时大声哭大声笑

漫天星辰都与我作伴

在人间漂流 在人间漂流

与朋克一代相比，徐波认为新生代乐队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我们想的更多的是自己能做些什么、改变什么，而不是我要去反对什么和标榜什么。”

“武汉现在每个高校都有很多乐队，还会一起办摇滚音乐节。”90后贝斯手狗狗上大学时已经是2010年代，她加入过几支校园乐队，各类风格都尝试过。“现在很多乐队的风格很难按传统分类来定义，表达上也会更私人化一些，观点比较少，情绪比较多。也很难说有什么武汉的地方特色。”

封城前后的音乐人们

“封城的消息公布得很突然，但家人都在武汉，所以我也没有离开的打算。”被困武汉家中的徐波说。他有个大学老师被感染，也有同学的家人被感染。截至2月18日，武汉累计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超过4万人，占全球总数过半，几乎每个武汉人都有认识或间接认识的人被感染。

据徐波介绍，“Chinese Football”乐队的吉他手也在武汉，鼓手则在疫情也很严重的湖北鄂州。乐队最近的演出都被迫取消，包括他们之前很期待的和美国乐队“Tiny Moving Parts”

的共演，计划中的欧洲巡演可能也会推迟。

身处湖北其他地方的人同样备受煎熬。“家乡的新增病例最近有所缓解，但内心依然是焦灼状态，”朱明康说，“因为这边的医疗水平、公共卫生条件相对不发达，一旦感染的话致死率可能会相当高。”

朱明康和丁茂都在湖北宜昌老家，他们原本计划过完年后返回深圳，开启“花伦”乐队新的音乐计划，但现在遥遥无期。

丁茂家在宜昌的一个偏远小镇，因为县城搬迁，人口比以往少了很多，整个县目前确诊患者不到10例。即便如此，他仍然感到焦虑。和他同一天回家的姐夫在武汉工作，住的地方离重要疫源地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公里，这让全家人都很紧张。

除夕夜，丁茂有点感冒，于是在自己卧室裹着被子单独隔离。“被子里太热，被子外太冷，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温度失去了判断，只能倚仗体温计。”那晚窗外雷雨交加，他突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老话“腊月打雷，黄土成堆”（意指天象不吉，会死很多人）。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北京工作的狗狗、远在欧洲的吴维，也时刻挂念家乡的状况。跟每个身在外地的武汉人一样，他们每天都会上网看疫情的最新消息，问候身在武汉的亲友。

狗狗在1月份看到疫情蔓延的消息后，在封城前就取消了回老家过年的计划，但同样在北京家中闷了一个月。她原本和几位同乡约好，过年时要在武汉一起出门“过早”（武汉方言的吃早饭），吃她心心念念的三鲜豆皮和热干面。

今年初，她和一位北京吉他手正式开始了名为“HINC”（拉丁文的“因此”）的二人音乐计划，目前已经写了五、六首歌。他们本想年后开始排练，并筹备正式演出。但北京同样全城戒备，所有 Livehouse 和排练室都暂停营业，这个计划只好无限期推迟。



HINC 组合贝斯手狗狗。图：受访者提供

吴维三年前从武汉搬到广西阳朔居住，1月17日从广州出发去了葡萄牙，之后才得知国内肺炎疫情已经很严重。他原本计划四月份回国，准备新专辑《东方往事》的发布会，但现在只能观察疫情发展再做决定。

在空闲时间，吴维主要在看书，思考和记录当下的心情和想法。他最近看的书包括葡萄牙诗人佩索亚的诗集，以及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作家汉德克的《痛苦的中国人》。

隔离在家的徐波，这段时间会通过视频给乐迷们弹吉他唱歌，近期还会参与一个线上音乐节的直播。

朱明康的奶奶给他翻出来一把缺了弦的国产吉他来解闷，他每天都会弹一会儿。丁茂要幸运一些，之前大包小包地把合成器、录音笔和一些小设备都带回了家。他录下了一些雨声、河水声，还有父亲的口述家史，用这些素材做了点“奇怪的声响”。

“不过玩了两天我就腻了，这些声音也只是声音，是人赋予了它们意义。”丁茂说，“现在这种环境下，我什么都做不了。”

灾难当头，音乐还能做什么？

徐波相信音乐能起到抚慰心灵的作用，他最近常听美国独立乐队 Yo La Tengo 的专辑《Summer Sun》，因为能帮助睡眠，让他平静。狗狗则在重温香港乐队“My Little Airport”不久前举办的“催泪的滋味”演唱会，这让她获得更多力量。

本次疫情发生后，跟以往历次灾难时一样，有不少明星艺人或官方机构纷纷制作为武汉加油的新歌。

“这次灾难并非像以往的天灾，人们能通过音乐来表达、调动集体情感和力量。”朱明康认为，对于战斗在一线的医护、活在恐惧里的病人和家属来说，这种音乐毫无意义。丁茂也直言，“想对那些我听见的尝试治愈人心的音乐作者说，你们太吵了。”

对徐波而言，音乐创作仍然是他表达态度的重要方式。他最近在家写了一首歌，歌词里有一句是：“用清醒的大脑，把谎言蒸发。”他解释称，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官方的言论，都有可能是真相或谎言，“所以必须保持学习和思考，保持清醒的大脑，由自己来判断对错。”

但最让他难受的，是网上求救信息和新闻底下的那些恶意留言。“在他们（恶意留言者）看来，任何不和谐的声音都是‘带节奏’，都是造谣甚至‘境外势力’。”徐波说，“我从他们身上感受不到一丝人性。”

最近没什么心情听音乐的朱明康和丁茂都感到很悲观。“看到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武汉，变成现在的样子，几乎每天都有让人揪心的事情发生，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家庭、悲鸣的哨声……对人的意志和精神都是消磨。”朱明康说。

丁茂也很难缓解家人和自己的焦虑，他转述父亲的话说：“我们这个家庭再经受不了任何一点冲击了。”“其实生活在这个小地方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如此。”丁茂觉得，“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战争，人人自危，但无从反抗。”



生命之饼乐队主唱吴维。图：受访者提供

在国外这段时间同样很少听音乐的吴维认为，这场“战争”的发生是彻头彻尾的人祸。“中国政府的官方报导和作为跟以往一样，就是掩盖真相，封口、封网，最后不得不封城。”他直截了当地说，“浪费了控制病毒的最好时机，导致现在这种残酷的状况，那么多人无辜牺牲。”

他同时感谢疫情当中为武汉提供帮助的各界义工朋友。除了摇滚乐迷们组成的鲁磨路救援会，当地的义工组织还包括：酒店业人士自发组建的医护支援联盟、专门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私家车主群体、不计成本为医护免费提供咖啡的咖啡厅……当然也有来自中国各地、通过网络筹集物资的志愿者群体。

封城第五天，闷在家的武汉居民们自发组织，晚上八点在各家窗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曲，视频传遍网络。有网友感慨，人们可以合唱的曲目如此匮乏。

“香港以前有《海阔天空》，现在是《愿荣光归香港》，台湾从《美丽岛》到《岛屿天光》，”狗狗很无奈，“我们自己三十年来没有什么集会的场景和文化，就只有年轻人在音乐节的那种大合唱，然后也只是他们喜欢的乐队的歌而已。现在有合唱的机会也无歌可唱，唯一能唱的就是国歌。”

但她觉得，这场瘟疫会像2003年的 SARS、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灾难一样，是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一个“启蒙时刻”。她最近也想写歌，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表达。但她也担心，即使写出了歌可能也无法发表，被更多人听到。她回忆起去年跟上一支乐队录专辑的时候，制作人听到歌词里唱了“oh fuck my day”，为保险起见要求他们改词，最终唱成了“a terrible day”。

“我希望所有觉得自己被扇了耳光的人，可以让自己当下的情绪持续得久一点，再久一点。”狗狗说。

“这里不会永远像一个监狱”

等到武汉解除封锁的那一天，狗狗想要第一时间回去“过早”，吃她日思夜想的三鲜豆皮，去中学时常去的汉口江滩芦苇地走一走，然后在一家酒吧喝自酿的名为“跳东湖”的啤酒。

“跳东湖”这项行为艺术活动源自“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为了抗议武汉著名景点东湖被填湖开发，建筑师李巨川与艺术家李郁最早在2010年发起了这一计划，吴维是2012年第二回计划的发起人之一。

对吴维而言，音乐仍是他最好的武器。他在今年将发行的新专辑里，临时加了一首翻唱的《东方之珠》为香港加油。吴维无奈地解释，“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大部分内地人连在香港发生的事件的真相都看不到。”

而面对离香港千里之外、他深爱的家乡，吴维早在2008年专辑《十年反抗》里就写了一首《大武汉》，来回应《Wuhan Prison》：

她会得到自由，她会变得美丽

这里不会永远像一个监狱

打破黑暗就不会再有哭泣

一颗种子已经埋在心里

这首歌同样适合封城中的武汉和被困城中的近千万武汉人。吴维表示，想对武汉说的话在这首歌里都说了，现在只希望大家都能在这次灾难中尽快度过险情难关，恢复健康和正常生活。朱明康觉得，除了帮助和关心身边人，反思和记录也很有必要。他希望在封城结束后，能为这个城市的重建尽一份力量，“同时，铭记灾难。”

感谢三水、狗狗对本文的帮助

新冠肺炎

朋克

独立音乐

武汉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消费停摆、中小企业告急，疫情令中国经济付出哪些代价？
2. 剃发、哺乳与卫生巾：“抗疫”中，被展演、挪用与牺牲的中国女性身体
3. 新冠肺炎患者口述：我看着殡仪馆的车停在发热门诊侧面
4. 钻石公主号之疫：1337个房间，14个惊恐日夜
5. 实习医生来信：致每一位在疫区中生活的香港人
6. “中医抗疫传说”是如何打造的？
7. 缺席的领袖身体：关于“亲自”的笑话与灾难中的政治奇观
8. 疫情预警迟到，谁在推卸责任？
9. 疫情来袭，中国公民意识会重新苏醒吗？
10. 武汉病人

编辑推荐

1. 五个“病毒”，不，五个“抗体”的集会
2. 武汉作为“朋克之城”：自由的头脑如何面对瘟疫、谎言与封城
3. 陈柏谦：台湾“小明”争议，无关人道关乎事实
4. 封城记：等待包机的武汉外孙与台北母亲
5. 下一个全球大流行病，世界仍将猝不及防
6. 腾讯入股环球唱片：中国音乐产业建立了“文化自信”论述？
7. 钻石公主号之疫：1337个房间，14个惊恐日夜
8. 社会学家周雪光谈肺炎危机（下）：当务之急不是社会适应政府，而是政府适应社会

9. 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人类当下的困境

10. 剃发、哺乳与卫生巾：“抗疫”中，被展演、挪用与牺牲的中国女性身体

延伸阅读

周云蓬：《中国孩子》十年记，孩子们的墓碑如影随形

《中国孩子》只是一首歌，不应越俎代庖，过多地承担法律、媒体、教育，以及每个人内心的良知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对谈周云蓬：当代中国还能找到什么“诗意”吗？

若是现在我再写个《中国孩子》也不可能出唱片了，因为通过不了。

为什么摇滚乐能以石击大卵：木推瓜传奇史

十几年前，他们已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传奇，反叛压制，嘲弄权力；十几年後，他们是否从当年的极度悲观中挣扎出来……

小河自述：我的人生不是住进海景房搞 Party

如果国家是一个政权，我的音乐是失业者；如果国家是脚下这片土地，我的音乐是它怀里的枯叶与新芽；如果国家是四万万同胞，我的音乐是微不足道，也不容忽视的一次次哽咽与欢笑。